

#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 吴家庆

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指导是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的成功密码，亦是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重要论断，昭示出“两个确立”乃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是我们新的赶考路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的现实要求。

##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为中国“复兴号”巨轮领航掌舵

注重领导集体建设，致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及其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对全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机关，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核心领导层中需要有“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大家公认的、人民满意的”领袖人物为党和国家事业掌舵领航。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党内是否形成公认的领导核心，是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党能否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一时期，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党内制度建设不成熟，革命斗争经验不成熟，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导致党不断犯“左”倾、右倾错误，中国革命事业不断遭受失败。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带领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树立党中央权威，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这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中国“复兴号”巨轮指引航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党的领导核心既是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决断和战略决策上的核心，也是该阶段围绕时代课题进行理论创新的核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推进的时代课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到党的十八大以前，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中不断发展的，确立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行稳致远的制胜秘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十九大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相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远大而美好的梦想经过长期探索与积淀终于成为了党和人民的实践指向。但新的起点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全球复苏乏力，大国竞争分化，数字鸿沟继续扩大，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蔓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头成为改革常态，需要防范化解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与日俱增，贯穿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者，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新的征程中劈波斩浪、奋勇向前，稳步驶向民族复兴的彼岸。（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转自广西日报2021年12月20日第六版）



廖善维/摄

## 向雷锋同志学习



# 《五帝本纪》的书写与司马迁的古史观

● 龙文玲

《史记·五帝本纪》构建了黄帝、颛顼、帝、尧、舜传承的古史谱系，这一谱系长期遭到质疑，并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例证。然而，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出土，史前文明不断发现，不仅需要重新审视司马迁构建的五帝谱系，而且更需重新理解其为何书写，以及其中蕴藏的古史观念。

## 广搜史料、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

关于《五帝本纪》的书写，该篇篇末的“太史公曰”，给出了三个重要信息：

一是创作动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说明司马迁的创作缘于《尚书》没有记载尧以前的历史，希望补缀历史缺憾，补齐中国上古史发展脉络。这样的使命感，体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勇气和魄力。

二是文献来源：“孔子所传事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说明司马迁所据文献以传世文献为主，田野考察资料为辅。传世文献，主要有《尚书》、诸子百家著作、《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田野考察资料，主要是司马迁前往传说中五帝到过的空桐、涿鹿、东海、江淮等地，向当地长者调研获得的口耳相传资料。

三是文献处理方式：“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参以前段所引，可知司马迁将搜集到的田野资料与传世的古文进行过对比分析，剔除“不雅驯”者，而保留下典雅之训。所谓“古文”，即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所云：“若《五帝德》、若

《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司马迁将田野考察资料与《五帝德》等古典典籍对比分析后，还得出它们对五帝风教记载具有一致性的重要结论。

以上信息，表明了《五帝本纪》书写的基本原则：全面网罗文献资料，择雅黜野，析理探微，按照时间先后次序，对五帝历史进行整齐编排。

就《五帝本纪》对五帝谱系的言说看，黄帝为少典之子，传位给其子颛顼，颛顼传位给族子帝，帝传位给其子尧；尧将帝位禅让给同族玄孙舜。这一帝位传承依据的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继承者的德才。如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帝“顺天之义，知民之意”；尧“其仁使能，体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勇气和魄力。

尽管《五帝本纪》是以传世文献和田野考察为基础的，但其真实性却长期遭到质疑。如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认为：司马迁所作本纪，尧、舜、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导致“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缪哉！”梁玉绳《史记志疑》还指出，按五帝世系，舜为尧族玄孙，则舜娶尧女“是以族曾孙娶曾祖姑，不更湮乱乎乎！”且鲧、禹历仕颛顼至舜四朝，实在过于长寿；“尧舜在位，凡百五十年”，亦令人难以置信。对此，一些学者试图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五帝本纪》的

## 隐藏的文化记忆

可靠性。如隋文鹏《《史记·五帝本纪》的考古学基础》提出：“《史记·五帝本纪》具备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换言之，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群伟大的部落联盟最高统治者，他们筚路蓝缕、朝乾夕惕，创造了了不起的人类文明。”一些学者试图从民族学角度肯定《五帝本纪》的合理性。如孙锡芳《《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认为：“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以上不同的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为何如此书写。由司马迁“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看，他搜集的关于五帝事迹的文献中，除有“不雅驯”的内容外，可能还有不一致乃至相矛盾的内容。比如，就《五帝本纪》载尧舜禅让一事，司马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豳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竹书》，即西晋时出土于战国魏安釐王墓的《竹书纪年》。由此记载，可知关于尧舜更替还另有说法：舜取代尧靠的不是和平禅让，而是血腥武力。但司马迁在写作中，选择了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的和平禅让，而对武力取代的说法予以忽视，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去要求《五帝本纪》的话，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司马迁对《竹书》这类材料的忽视的。但如果从文化记忆理论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纪》书写的合理性。事实上，《五帝本纪》承载的乃是自孔子以来人们对“尽善尽美”德政的美好记忆，是建立在关于五帝时代回忆的基础上上的文化书写。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所说：“回忆文化则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在司马迁看来，不可遗忘的是五帝时代的君明臣贤、关注民生、“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德政文化。因此，他选择了称颂五帝德政之美的文献。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对《五帝本纪》的概括：“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即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在此，他强调的不是五帝具体的风教业绩，也不是帝位更迭的具体细节，而是黄帝开创的法天则地的政治秩序，以及颛顼等四帝遵序形成的可以万世效法的法度规范。

广西大学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首任校长马君武先生于1903年，最早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5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译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先生、《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先生都曾在广西大学任教。195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东莪教授任广西大学校长。目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修基地，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信息化联盟12个常务理事单位之一，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入选广西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学院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学科建设、教学竞赛和信息化技术应用方面不断发力，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科研育人、课程育人、思政育人的深度融合，实现思政战线上育人又育己，立德树人中师生共成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 以学科建设引领科研育人，实现教研相长

学院以学科建设助力科研育人为导向，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实施入学前“扶一把”，即在研究生选拔过程中要求学生提供一份科研规划，并将此作为入学的重要标准予以考核。在确定研究生录取后，根据学科方向制定书目并随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要求学生进行研读并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硕士6000字以上，博士10000字以上），入学后由导师修改审阅，反复修改后进行投稿发表。实施开学后“推一把”，即严格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制，从师生“双选”到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论文送审、毕业答辩，从日常管理到学术培养，每个关键节点都做到导师步步紧跟，全程护育。每周二、六晚，由分管副院长组织博士生导师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科负责人组织本学科导师和硕博研究生，每周进行一次前沿问题研讨。为师生提供最优质的科研学习保障服务，给每位教授配备独立工作室，为每位博士生提供学习卡座，为硕士生提供公共研修室，实行打卡考勤。实施毕业前“送一把握”，即在学生毕业前利用脑电实验室，脑电实验室等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及时缓解毕业生的各类焦虑情绪。开展“老手拉新手”活动，邀请优秀毕业生来校分享职业和学业的成功经验，助力毕业生做好职业规划和学业深造。给每个班级配备专业班主任和兼职辅导员，持续跟进学生职业发展和学术成长。

三年来，学院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软科2020年排名进入前5%（全国第17名），2021年进入前7%（全国第25名），2022年进入前6%（全国第21名）。师生在学科发展的助力下取得丰硕成果，共获省部级以上项目4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5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在“三报一刊”发表理论文章12篇，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118篇。学生就业率在95%以上，考研率达到45%，考博率达到10%。

## 以教学竞赛推动课程育人，实现教学相长

学院以教学竞赛为抓手，充分发挥课程育人功效。实行以“赛”促“教”，以教学竞赛能力和素养要求为标准，每周二下午进行教研室教师集体备课，每周五下午开展教师理论大学习。暑期开展全员集体备课，邀请全国知名教师现场一对一指导，为每位老师磨课练课提供专业意见。每学期组织师生开展评教，邀请学校教学督导组进行全员课堂全覆盖式督导。实行以“赛”促“学”，以参加各类教学比赛为契机，充分发挥师生在课程建设和学习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实行本科专业导师制，深度参与学生各类学科竞赛的指导工作。实行以“赛”促“建”，以竞赛课程为单位，优化教学团队，要求每门课程培育3名金牌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每名教师要打造一堂金课。在一流课程、一流专业建设、课题申报过程中，实行老人带新人制度，“搭台子，组专班，配能手”组建优势团队，明确课程、教学建设的攻关方向，推动思政课程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三年来，学院师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奖50多人次，多位教师取得优异成绩并获得荣誉称号。其中1人获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并获教学学术创新奖和教学活动创新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1人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1人获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第一名并获广西五四青年奖章、广西教学能手称号。1门课程获推举国家一流课程，2门课程获广西一流课程建设，学生评教85分以上思政课达到100%。

## 以信息技术助力思政育人，实现师生共长

学院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研发线上思政课实验教学App平台，使手机变成“学习利器”。该平台集知识点、微视频、教学案例、课后阅读书目、随堂测验、模拟考试于一体，具备考试、评教、考勤、讨论、答疑等多重无纸化功能。打造线下VR虚拟仿真互动体验中心，使思政课真正“活”起来、“火”起来。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建立“中共党史馆”“改革开放馆”“复兴之路馆”等静态场景，还原真实场馆环境，使学生能够达到身临其境的体验效果。利用大空间定位技术开发“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南海及周边环境”等动态实景，实现多人同场域互动，通过虚拟技术进行深度学习体验。

三年来，学院以现代科技为纽带，用虚拟仿真为代表的现代技术覆盖所有本科生的思政课堂，实现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师生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世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技创新平台。学院教学创新被党中央及地方媒体广泛宣传，并形成一定示范效应辐射区内外多所高校。（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本文转自光明日报2022年3月16日第8版）

## 继往开来的古史观

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疆域空前阔大。诚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说：“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当时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往来、融合，盛况空前。回溯过去，是为了构建当下，开创未来。受时代感召，司马迁通过对古史的回溯，对五帝时代进行整合、重构，“为后世史家立则法凡”（钱锺书《管锥编》）。基于此，他描绘的五帝时代蓝图除了君明臣贤、以德治国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幅员辽阔的大一统。黄帝时代东至海，南至江，西至空桐，北至涿鹿；颛顼时代东至嵎木，南至交阼，西至流沙，北至幽陵；帝尧时代东至阳谷，南至南交，西至昧谷，北至幽都。这些五帝疆域的描述，其实是建立在古史传说与汉帝国实际疆域基础上的想象，体现的是汉武帝时代大一统的思想。

二是民族和谐的大融合。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五帝其实并非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分属于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的民族。但在《五帝本纪》中，颛顼、帝、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此外，夏禹、殷契、周后稷均为黄帝玄孙，秦、匈奴亦为黄帝的后代，东越、南越、西南夷的先君也都可以溯源到黄帝。这一书写，其实是将汉武帝以前各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了重构，表现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要而言之，《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大量早期文献和文化记忆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建构。它虽然不是“信史”，却包含了上古以来各民族丰富的历史记忆，说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虽有“拼凑”之痕，却符合中华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过程，体现了大一统的文化理想。正因为如此，“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才被后世所认可，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起着无可估量的巨大凝聚力量。（作者系文学院教授，本文转自《光明日报》2022年1月22日11版）

责任编辑 李伟红 黄南 刘娜利 廖善维  
 美术编辑 刘娜利 廖善维  
 校对 李真 贾琦艳 苏锦春 周晓璐 陈周硕 董钦文